

## 第 5 章

# 阶 级

### 5.1 高富帅 屌丝反映的本质是阶级属性与归属

#### 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太。  
乐(yuè)与饵(ěr)，过客止。  
道之出口，  
淡乎其无味，  
视之不足见，  
听之不足闻，  
用之不可既。

本章主旨：人、社会、自然和谐平和，道的精神内在。治国者如果能够掌握和遵行大道，那么天下百姓就会归心向往；归心向往而互不伤害，于是天下就能够安定太平。

治国者掌握和遵行大象无形的大道，天下的人民就会归心向往。人民归心向往治国者而互不伤害，于是天下就会安定太平。

动听的音乐和美味的食物，能够使过路的客人之为之停止脚步。而道用语言从口里说出来，给人的感觉却是清淡无味，不像美味食物那样；人们想看见它的形象却无法看见大象无形，想听到它的声音却无法听到大音希声；然而处事运用“道”的特性来发挥作用却无穷无尽。

当人群之中出现差异，并且这样的差异已经导致部分人拥有凌驾其他人的地位、权力、特权时，这就称为社会阶层。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使阶级的出现成为可能，而剩余产品的出现成为阶级产生的物质前提。社会阶层不仅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还是整个社会的特质；不仅牵涉到社会不平等，还牵涉到人们的信念。

如今人们都在回避或者不再用“阶级”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阶层或其他的表述，只是



不想引起更多的敌意和对抗,但是,在一个社会中只要存在着经济,不同行业的分工则不可避免。

不把阶级看做共同体,而应看做社会行动的群体,类似于种族群体。阶级概念的真正含义始终就在于:市场机遇的性质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构成了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状况最终就是市场状况。

只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对比,就会发现人的出发点和角度是如此不同,认同和理解,本是我们作为社会人的基本需求,刷存在感还是迎合他人,都是为了寻求被认同被理解。

只有认同了才会有情感的共鸣和统一,才会有归属感。比如“好的情感”是引导你继续做那件事情;“坏的情感”是引导你不要再做那件事情或换一个路径去做那件事情等。

具体的劳动者追求自身利益的走向也大为不同,个人在自身利益问题上可能会判断错误,但阶级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却永无谬误。

这取决于他天生的资格条件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来说是优、是平还是劣。但是它们都是引导我们更好存在的,这应该是文化的自觉,这是个体意识的统一。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由生命链组成的,即使个人消亡了,人类还是在不断获得新生。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说明了类似的问题:马斯洛把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5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人的需要有轻重层次之分,在特定时刻,人的一切需要如果都未得到满足,那么满足最主要的需要就比满足其他需要更迫切,只有排在前面的那些属于低级的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产生更高一级的需要。

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激励的角度看,没有一种需要会得到完全满足,但只要其得到部分的满足,个体就会转向追求其他方面的需要了。

但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其阶级的主题意识进行概括。简单地说,就是要有人系统地理论上概括这种阶级意识,继而阶级意识才会传播于本阶级成员之中,得到本阶级成员的认同。如果没有能够概括出本阶级意识的人,没有他们对本阶级意识的理论概括,阶级意识也无法形成。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小农意识,始终没有一个思想家对这个阶级的整体意识做出概括,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比如奴隶起义、农民起义时,才能显示出被统治者阶级的政治存在。进行概括从某种共同的阶级状况中产生出一个联合体或社会行为就是大众行为,生活机遇的反差才能被感觉到既成事实。

白富美、高富帅、屌丝等互联网流行语反映的本质就是阶级属性与归属。这是大众行为的表现。另外,在意识的世界里,人一旦意识到意识自身并对意识进行模拟,便产生了“人工智能”,标志着人类的意识发展到了高级的阶段。

正如牛顿因为发现支配宇宙中的物体的定律而统治 17 世纪的科学那样,达尔文因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了 19 世纪的科学。他的进化学说认为,处于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它们是不同的、可变的,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自然结果。

达尔文认为,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选择”,他将这一过程阐释如下:因为所产生的每一个物种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得多,各生物间便经常不断地发生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就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也许很难把自然界中所有的变种都设想为似乎是像“自然选择”所提供的那样,一个十分缓慢的变化过程的产物。达尔文否定了神造世界说,正如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废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样,达尔文主义似乎废黜了人类在地球历史上的中心地位。

各国的民主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与在自然界一样,最强者是德胜者,好战的品质决定谁将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获胜。在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俗的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舒适、心满意足的上、中层阶级强烈反对国家为促进更大的社会平等而做出的任何干预。

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兼并也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19 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这种将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舞台上的做法,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up>①</sup>

## 5.2 消费变得更像炫富 身份群体植根于消费领域

###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属:  
 见(xiàn)素抱朴,少私寡欲。

本章主旨:回归淳朴,拒绝异化,是对大道废后的社会弊端医治的主张,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供人们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可遵循的原则,以期复返于民风淳朴的至善

<sup>①</sup> 《全球通史》,第 486 页第一段



之世。

不以圣人自居,不以诡智阴谋权术治国,不自作聪明,这样民众便可以获得百倍的利益。杜绝、抛弃人为的仁义,这样民众才能够恢复自然真淳孝慈的天性。杜绝不正当的技巧,舍弃不正当的利益,这样盗贼就不会出现。这三者用来作为教化人的条文还不够充分,所以还要予以补充使人遵从的原则即是保持人的自然、质朴之性,减少人的自私、贪欲之心。

作为社会阶层中的个体,我们高兴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伟大,我们失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渺小,究其原因这是意识中的双重性质最明显的表现。一方面,觉得自己是个体,是脆弱的、无助的意志现象,只要些许这种力量就可以完全毁灭。面对自然的巨大力量,作为活的人身,作为无常的意志现象,就像流星一瞬、就像沧海一粟似的,在消逝着,在化为乌有。面对着自己这种虚无的幽灵,感到了自己的躯体渺小近于零。

正是那些使我们成为恶人的原因,也使我们成了奴隶,使我们愈来愈堕落、愈来愈邪恶。我们之所以感到自己的力量微弱,其原因,更多地是来自我们的贪心,而不是来自我们的天性。

如今人们各个贪得无厌,人心浮躁不安,尔虞我诈,人口不断流动,贫富穷通变化无常,消费变得更像集团炫富。在古罗马年代如果富人太显示自己的富有的话,是会被贬到穷人的等级去的。

另一方面,一旦当我们忘却自己的个体性,就会发现自己在这种认知活动的主体。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与世界合为一体,因此,世界的这种无边无际对我们来说,并不觉得是压力,反而使我们精神昂扬。

再来看看阶层收入。每一个文明社会三大原始组成阶层的收入:依靠地租收入生活的人,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以及靠利润收入生活的人。任何一个其他阶层的收入最后都是从他们的收入当中剥离出来的。

由此可见,三大阶层当中的第一阶层的利益是严格地以及不可分割地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联系的。每当公众考虑关于商业或者政治的任何法规的时候,土地的所有者为能促进他们自身阶层的利益是从来不可能把公众领错路的,最起码在他们对于利益还有一定的了解的时候是如此。

确实,他们也经常是在这个理解上有一些欠缺,他们是三个阶层当中唯一的一个阶层:他们的收入既不需要他们劳动,也不要他们操心,那些收入好像是自己跑到他们手中去的,而且不依赖于他们的任何计划或者规划。他们舒适以及安全的地位产生的自然的结果就是怠惰,这个怠惰也常常使得他们不仅无知,并且没有运用他们的头脑去预见以及理解任何公共法规会产生的后果。

依靠工作为生的第二个阶层的人的利益,和第一个阶层的人的利益相同,也是严格地和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劳动者的工资只是那时劳动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或者当

每年雇佣的劳动量大幅度地增长的时候才最高。

当社会的真实财富变成停滞的时候,其工资马上就会降低让他们仅够养家糊口或者维系其种族。每当社会变衰退的时候,工资还会下降到这个限度以下。

雇主们组成第三个阶层,他们依靠利润为生,他们将每一个社会的有用的大多数劳动投入运行,他们所投入的资金是为了获得利润。拥有资金的雇主们的计划以及设计调控着并且指挥着所有最重要的劳动活动,而利润是所有那些计划以及设计的目的。不过利润率并不像地租以及工资那样随同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着社会的衰退而下降。

反之,它在富裕国家当中相当的低,在贫困国家当中自然而然的高,并且它总是在最快地走向灭亡的国家中最高。

因此,第三阶层的利益并不像那两个阶层一样和社会的总体利益有那样紧密的联系。在这一阶层中,商人以及制造业主常常是投入资本最多的两个阶层,他们通过财富将公众绝大多数的尊敬吸引到自己身上。

在整个一生中,他们从事计划以及设计,所以他们的理解力要比大多数乡绅更加敏锐。因他们的思想主要思考的是他们自己的特殊部分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因此他们的判断即便具有非常大的坦诚,在每种场合都会是更多地偏向于他们的利益。<sup>①</sup>

一个最基本的经济事实是,许多人为了交换的目的在市场上进行竞争,而物质财产处置权在他们当中进行分配的方式,本身就创造着特定的生存机遇。按照边际效用原则,这种分配模式将会把没有钱的人排除出对高价值货物的竞争,它有利于有钱人,并且实际上给了他们获取这种货物的垄断权。

这种分配模式能使有产者垄断机会以把财产从“财富”的使用领域转移到“资本”领域,就是说,给了他们经营者的功能以及所有直接或间接依靠资本赢利的机会。这一切在纯市场条件占了优势的地方都是行之有效的。因此,“财产”和“无财产”就是所有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sup>②</sup>

马克思说:“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财产代表了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以及各种矛盾的社会表现。如果缺乏必要的张力,社会无法前进;如果矛盾张力过度积累,社会矛盾就会演变成破坏性的力量。

这是因为物质利益对人们的观念、上层建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既定社会的经

---

① 《国富论》第 129、130 页第三段

② 《经济与社会》第 1064 页第二段



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物质利益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状况。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社会的进步助长了个人的利益,从而窒息了人的同情心;自然的法则的观念,只有在欲望事先的发展完全满足后,使它的原则全都无用的时候,才开始逐渐形成。阶级根植于生产与获利的领域,身份群体则植根于消费领域。

### 5.3 假如身份荣誉平等 财产本身就等于一道加法

####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  
天下多忌讳,  
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  
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  
法物滋彰,  
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本章主旨:无为政治的功效,能使风俗淳朴,正反两个方面入手论述治理国家应该实行“无为而治”达到排除了外力干扰之后的自然而然的状态。

以正道治国,以出奇制胜的诡道用兵,以清静无为之道则可以取得天下百姓的人心,从而治理天下。我是根据什么知道应该如此做的呢?就是根据如下的社会现实情况。

国家颁布的禁令越多,必然导致民众无所适从,因此民众就会更加陷入贫穷;对民众使用的镇压手段越残酷,必然导致被压迫的反抗,因此国家就会更加陷入混乱;对民众掌

握的技巧越重视,必然导致民众趋之若鹜。

因此,稀奇古怪的物品就会更加兴起;对珍奇之物越炫耀,必然导致民众心生贪念,因此,盗贼就会更加增多。

所以,有道的人教导我们说:“我顺其自然而不干涉,民众就会自然发展;我崇尚清静而不干扰,民众就会自然安定;我不生事扰民,民众安居乐业,于是就会自然富裕;我没有贪欲,民众以为楷模,于是就会自然淳朴。”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我们在与他人交往时,便开始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身份。身份具有多重脸谱。

尽管地球上到处都有人,但在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往。我们在某些点上互相接触,但在任何一点上都不互相结合,每个人在人群中依然是孤立的。每个人都只想到他自己,我们的智慧得不到发展;我们活着,但领略不到生活的乐趣;我们还没有真正生活过就离开了人间。

这是来自卢梭社会契约论里的经典话语,让我们深思。

他在《爱弥儿》第四卷中也说过,人之所以合群,是由于他的身体柔弱,我们之所以心爱人类,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苦难。如果我们不是人,我们对人类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对人的依赖,就是力量不足的表征;如果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根本就不想同别人联合了。

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爱我们的同类,与其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快乐,不如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在痛苦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出我们天性的一致,看出他们对我们的爱的保证。如果我们共同的需要能通过利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则我们的共同的苦难可通过感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需要使我们彼此互相接近,而我们的贪欲却使我们互相分离;我们愈是成为我们同类的敌人,反而使我们更加觉得不能没有我们的同类。普遍社会的原始纽带就是如此;它是普遍的仁爱之心的基础。

然而,尽管大家都认识到了这种仁爱之心的必要性,而这一必要性却反而扼杀了我们的感情。大家都希望得到仁爱之心结的果实,可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去培育。对人类来说,这既是引起他们争吵的原因,同时也是使他们相结合的原因;即使他们经常彼此竞争和互相嫉妒,同时也使他们互相理解和互相协作。

这就产生了许多既难以估量又没有规则而且也不稳定的关系。人们经常在不断地破坏和改变这些关系;对他来说,宁静和幸福都只不过是弹指即过的事;除了从这一切变化无常的境况中产生的苦难是永恒的以外,其他一切都不可能永久常存。即使他的感情和思想上上升到爱秩序和爱美德的程度,他也不可能无法分辨善与恶和好人与坏人的状况下准确可靠地运用他的为人的原则。

所以,像我们这种由于互相需要而产生的普遍社会,对苦难的人们是根本不可能提供



有效的援助的；它只能对那些已经有过多力量的人增添新的力量。而遭到忽视和欺压的广大弱者，既找不到安身之处，也没有谁对他们伸出援手，最后只好沦为他们以为可以从中得到幸福的虚假的结合的牺牲品。

只要我们对我们的苦难麻木不仁，毫无知晓就算是幸福了。我们的心中没有善，我们的行为中没有道德。我们永远认识不到，心灵的美就美在对道德的热爱。

所有文化都担负着帮助本文化的成员形成身份认同的职责。我们来到世间时并无明确的身份。通过无数次交往，我们发现了自己是谁。家庭赋予个体最重要的社会身份。在印度，男性被视为高高在上的。男孩子被看做是由神托付给父母抚养的。

甘农如此概括印度的性别观念：重男轻女的观念跟印度社会一样古老。儿子保证家族血脉代代相传。当长者去世时，儿子进行最后的祭礼。在生命的轮回中，逝去的灵魂得到抚慰，新人接过前人的重任。梵语中，“儿子”(putra)的意思是“让你免下地狱的那个他”。

我们身处其中的独特人类文化链条是个体身份的核心，身份的价值理所当然往往表现在它与生俱来的目的性上。身份特性的发展是每个人心理上获得幸福的关键。没有稳妥身份特性的人就会陷入混乱，不知何去何从。

尽管信息技术的影响力和全球化，但是身份的特性越发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张力。布鲁克斯认为，人们面对与自己文化特性不同的群体，也就是与自己有着不同政见、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人，无论从社交上还是从心理上都会愈加自我隔离。

这种不确定性源于日新月异的世界秩序，传统社会结构的颠覆也使很多人感受到高度的不确定性。就在人们努力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动不安的时候，身份特性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它决定了人们怎样生活以及和哪些人交往。<sup>①</sup>

媒体对身份的培养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媒体中人物形象频繁地近距离接触，让一个人逐渐明白了如何让外形、穿着、举止与自己的年龄和性别相适合。人们利用媒体来教化并借此为不同的团体遴选了新的成员，新的成员因此获得和培养了一种新的身份。

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获得需要个人努力，而不是与生俱来、委任世袭的，也不是论资排辈。这样，由于每个人都相信，有机会来提高自身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就会创造出一种社会流动性的环境。

在日常生活中，随着不同场景的转换，我们实际上都在随时建立、重建并且履行着不同的文化身份。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我们在交流传播当中不断地产生、重新产生自身的文化认同。

如上所述，当人们和其他人互动时，要不停地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每切换一个新

<sup>①</sup> 《跨文化传播》第101页第四段

的身份,人们就会使用一系列与身份和环境相适应的交流方式。

大部分人长期尝受低下身份在社会中受蔑视、凌辱,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够身居高位身份。但现实中多数人尚不能一步踏进理想的高身份地位,于是心理产生一种浮躁和焦虑。我们把这种心态也看做是身份情结的一种表现。由此可见,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是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而产生心理习惯的相似性;以及基于共同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理想追求的聚合性。

从人类社会来看,最初身份只是指个体成员交往中,识别个体差异的标志和象征。它给予社会以秩序和结构。身份群体尽管常常不定型,但却是真实的群体,对于他们来说,正面或负面的社会荣誉是身份群体的基础,身份差异体现在生活方式上。人人都想在社会中捞名捞利,他们垄断的是观念、实物或机会。这是人与人之间一切差别的总根源,身份生存重于个人的生理生存。

另外,除了特定的、始终以距离感和排他性为基础的身份荣誉之外,荣誉的优先权还包括车、住房、奢侈品的特权,也就是说,是物质上的垄断权为身份群体的排他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动机。生活方式对身份荣誉具有关键作用,为报酬而工作常常会导致丧失资格,这本身就是身份分层原则的直接结果。

支配着市场的是功能利益,它也不知荣誉为何物。身份秩序则意味着恰恰相反:按照身份群体本身特有的荣誉和生活方式分层。如果单纯的经济获取和赤裸裸的经济权力使身份秩序不断蒙受这样一种耻辱,即非身份出身也能给予赢得这种出身的任何人以同样的,甚或更大的荣誉作为他们有权要求的既得利益,那么身份秩序就会从根本上受到威胁。

毕竟,假如身份荣誉是平等的,那么财产本身就等于一道加法,所有与身份秩序利害相关的群体,都会对纯粹的经济获利要求做出特别激烈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越是感觉到了威胁,做出的反应就会越加激烈。

不管那暴发户已经多么彻底地适应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只会接受他的按照身份群体惯例经过熏陶且从没有让自身的经济努力玷污了身份群体荣誉的后代。<sup>①</sup>

由此便出现了某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阶级是按照它们与货物的生产及获取的关系分层的,而身份群体则是按照它们体现在生活方式中的货物消费原则分层的。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就是一个身份制社会,讲究身份。成员的生存资源主要依据身份及身份之间的关系而配置,这种身份制度主要体现在君权、父权和夫权上。它对中国人的作用是持续的,这种持续作用在心理层面的深处也凝成一种情结。

使中国人的内心认为只有达到高的身份地位才是人生的最大成功和最大需求,而求得好的功名正是有了高的身份地位的象征。为此可以付出大的代价和辛苦作牺牲,并认

<sup>①</sup> 《经济与社会》第 1073 页第三段



为这是一个人向上进取的标志,否则被认为没有出息。

最早的身份来自科举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两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儒家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所进行的依靠法律和制度,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

中国的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时,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它们从下到上的顺序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县试,然后是省城的乡试,最后是京城的会试。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

18世纪思想家几乎无不推崇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作开明君主制的模范;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sup>①</sup>

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或许可看做是一件幸事。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

但是,这些世纪却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的世纪,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崛起的世纪。<sup>②</sup>

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祸事,而非幸事。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是相对静止的、落后的。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阻止了中国人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 5.4 财富第一次在制度意义上被公平分配

当货币成为商业共同的媒介时,以物易物废止。特定商品就更加频繁地和货币交换。其实货币仅仅是商品的名义价格。货物的名义价格或者货币价格,最终决定了所有买卖行为的精明和失算,这也就是,调整着几乎日常生活中涉及价格的全部交易。

在交易中,交换经济蕴涵巨大发展潜能,财富第一次在制度意义上被公平分配。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到同等份额的财富,而是说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进而说明,社会井然有序的秘诀就是让每个人都全心为他,自己却认定是在一心为己。

<sup>①</sup> 《旧制度与大革命》

<sup>②</sup> 《全球通史》,第360页第一段